

陈嘉庚

与
陈敬贤

李光前
陈六使

《陈嘉庚丛书》

陈嘉庚与陈敬贤、李光前、陈六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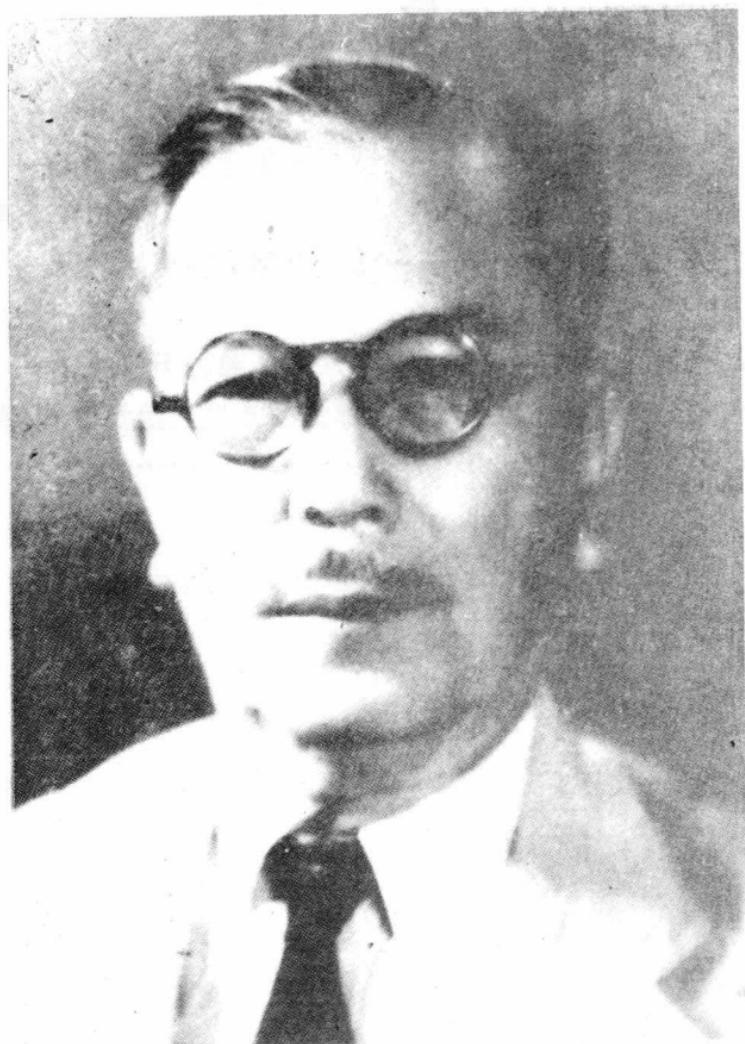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集美学校委员会合编
集美校友总会

陈少斌 蔡仁龙 著

1994年6月

革命旗帜 民族光辉
陈嘉庚

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陈嘉庚画册》题词手迹



1950年陈嘉应回国前夕摄于新加坡。

目 录

昆仲协力树伟业

——记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 … 陈延杭 陈少斌(1—7)

雏风清于老凤声

——记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 蔡仁龙(8—22)

实业兴学一脉承

——记陈嘉庚的族亲陈六使 ………… 蔡仁龙(23—32)

陈嘉庚、陈敬贤创办和支持发展的学校名录……………

…………… 陈少斌(33—36)

昆仲协力树伟业

——记陈嘉庚的胞弟陈敬贤

陈敬贤先生于1889年1月13日诞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的侨商家庭。他排行第五,八岁时就学塾。十岁时母亲孙太夫人仙逝。十三岁,随胞兄陈嘉庚往新加坡依附父亲陈杞柏(字如松)先生。1910年,与胞兄参加中国同盟会,在南洋宣传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制、创建共和的革命主张。在胞兄“热诚内向”的激励下,襄助胞兄开拓南洋实业,兴办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以有限的生命,报效社会,实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夙愿,是深受世人敬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

一、救国大计,端赖教育

1913年陈嘉庚为开发民智,改造社会,始创集美小学,遇到缺乏师资的困难,经过考察,发觉闽南小学师资同样奇缺,陈嘉庚同胞弟陈敬贤反复研讨以后,认为:“以救国大计,端赖教育”。于是决心创办师范学校和中学。1916年10月陈敬贤返乡筹办,从新加坡携带校舍图纸和承包建筑人员回国,立即选择校址开始筹建。1917年5月,亲赴直、鲁、鄂、皖、苏、浙、赣等省考察教育,聘请校长和教员,行前先发函闽南二十余县勤学所长,请代招学生,以后又在厦门地区亲自招收学生。

1918年1月,主持建筑校舍居仁楼、尚勇楼。是年3月10日,集美师范、中学校开学,学生196名,他亲致开学词。同时,与胞兄共定“诚毅”校训,颁布校歌和教职员服务简章等。学生膳宿费全免,被褥枕席、书籍用具也概由学校供给。5月,校长

王绩辞职，他再赴江浙考察教育，聘侯鸿鉴（葆三）为第二任校长。6月“校主住宅”（即陈嘉庚先生故居）竣工，成为被师生、村民尊称为校主的陈嘉庚、二校主陈敬贤，轮流回乡主持扩建学校、发展教育事业的住所。年底，校舍立功楼和大礼堂、大操场、电灯厂、自来水塔、浴室、贮藏室等一批公共建筑落成，为师生的教学、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34年，教育部曾肯定集美师范学校创办多年，“著有相当成绩，而所造就之师资尚适合闽南及南洋各地之需要”。可见创办集美师范学校的目的已达到。

为了打破女子不得入学的封建枷锁，陈敬贤和夫人王碧莲深入家庭动员，解决女子入学的实际困难。1917年2月增设了集美女子小学，并开办了织布厂，使部分妇女得以就业，以利女红。1919年春，借用民房，积极创设集美幼稚园，充分显示出重视学龄前教育的远见。

1919年4月，他南渡接理陈嘉庚公司重任，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有力地支持集美学校的扩展和兴办厦门大学的经费，他却因操劳患病，1921年11月不得不回国调养。1922年5月至1923年2月到日本治病。返校后元气渐复，继续主持集美、厦大校务。

1925年5月，他支持胞兄陈嘉庚创办集美农林学校，以富民强国为宗旨，先后与叶渊校长、建筑部主任王卓生等，实地勘察，择定天马山麓为校址，购置附近久荒田地，筹建校舍、牧舍、试验场等，1926年春季农林学校顺利开学。

陈敬贤在侨居地经营实业时，也重视华侨教育。1919年至1921年，他当选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财政主管并担任道南学校总理，为两校作出了贡献。这时，胞兄在桑梓倡

设同安教育会，他即在新加坡发动同安侨胞认捐，自己带头捐献款万元，用实际行动促进闽南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主持校务时，十分重视德育，除与胞兄共定“诚毅”校训外又特别指出：“教育有智育而无德育，如人身之有肉体而无灵魂。”他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热心教育的最热情、最积极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他曾说：“兄既是心，为弟者若不尽力，谁肯尽力！”这充分表现了他爱国爱乡的崇高精神。

二、经营实业，积资兴学

陈敬贤先生十七岁时，因父亲企业收盘，胞兄陈嘉庚集资独营，即随兄习商。不久管理谦益米店财务和新利川菠萝罐头厂业务。他涉足商场仅两年，经营才能初露锋芒，出任谦益经理。1908年因商务繁杂，不幸患肺病，返故乡调养。

1910年，他携眷前往新加坡，参加同盟会，信仰孙中山革命道理。他深感：“国弱民贫，振兴实业，培养人才，教育实利赖之”。于是决心披荆斩棘，重整商业，开拓实业，在发展陈嘉庚公司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12年至1913年，他在胞兄回国筹办集美小学期间，首次独立承担经营新加坡一切商务。

1919年5月，他接任陈嘉庚公司职权操理全盘业务后，经商才华与领导能力进一步发挥。1920年至1921年，星马经济不景气，公司主营树胶业，因价格涨落不定，经营维艰。

1920年接胞兄函，改第一胶制厂为陈嘉庚公司树胶熟品制造厂。他添购涂桥头树胶制厂空地2万m²，使该处面积增加到5.5m²，为公司宏图大展创造了条件。

陈敬贤因承担庞大的公司业务，在激烈竞争中，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因而身患重病，不得不函告正在故乡倡办厦门

大学的胞兄南来，交接任后，他遂返乡。不久，前往日本治疗。身体稍有好转，复主持集美、厦大校务，兼监理陈嘉庚公司国内分行事宜。

为了扩大推销陈嘉庚公司树胶熟品制造厂出产的大量商品，他协助胞兄在国内外设立许多分支机构。如福州、厦门、广州、汕头、香港、上海、杭州、漳州、泉州、天津、汉口等分行。诸分行日常事务繁杂，他对省内分行的大事，力争亲临解决；省外分行各端，均由函件联络处理，虽是忙碌，却能胜任。

1925年10月至1927年1月，他第二次赴日本治病。回国后，在上海、杭州、厦门等处逗留，后移居禾山茂后社。

1930年，陈敬贤为了辅助社会发展商品生产与创造物资财富，他集资创办禾山济兴农林公司，向院前、山仔前、茂后购买园地700余亩，雇工开垦、种植各类树木、水果、蔬菜、豆稻等500余亩，并拟创设苗圃，以期十年后，农林发达，利益地方，造福人民。该公司茂后一带牌界不幸于1932年5月27日被日本籍民林某创办的厦南星牧公司执事率工拔除净尽。他据理抗争，诉讼未果，预期目的未达。

他一生竭诚发展为提供兴学育才经费的实业，却反对任何人利用在学校供职之便，私营与学校有关系之生意，“以杜绝因私废公之弊端”。同时，认真查处侵欠公款、贪污资财的职员，建立必要的制度，“预防其弊端”。他倾其全部资产，捐献给教育事业，不愿私积巨款，当胞兄欲以他的名字在新加坡存款十余万元时，他立即婉言谢绝，并说：“深明多积私财之为害，足以损智、益过，贻后辈倚赖之性，奢靡之行”，表现了他诚心诚意，为国家乐育英才，不谋私利的高贵品德。

三、公而忘身，积劳早逝

陈敬贤自幼体质虚弱，时常不堪劳累而病倒，影响了他才干的发挥和创业壮举的腾达。然而，他自强不息，顽强地与病魔作长期的斗争，实属难能可贵。

他与胞兄“自出共事以来，唯恨力之所不能及，而不敢稍事偷闲，虽拖病亦从事于工作，可谓因公而忘身”。1908年，他出任谦益米店经理后，就患了肺病。1919年至1921年主持陈嘉庚公司业务，在商战中心力交瘁，肺病复发，兼患痢疾、胃病，实难以肩负重任，只好又回国治疗。

他阅读《心理建设》获悉日本高桥先生治疗胃病有独到之处，遂东渡日本访高桥，由高桥介绍给藤田灵斋先生诊治。前后两次。

第一次，从1922年5月至1923年2月，陈敬贤在日本向藤田氏学习调和静坐法。1925年8月，他认为病未痊愈，若长此敷衍下去，不独对身体有害，而且对“所作之事亦无利”，决心再到日本治疗，期望清除病根，精力恢复，再出任务。

陈敬贤为了“造就有道德与智识兼备的人才，出来担负国家及社会的责任”，1923年10月在集美学校设立调和会，研究养生之术，广泛宣传调和法，在集美各校师生中发展会员，向家庭晚辈、分行职工店员教授调和法，希望以此加强锻炼和意志修养，提高师生身心素质。同时，组织集美学村委员会，会族众，申赌禁，设戒烟所，清理公共卫生，修造道路，净化环境，学村面貌焕然一新。

他初到日本治病时，医生诊断他的肺病已转入第三期，是属于不治之症了。但是，经过治疗、锻炼，身体有所恢复。他在追思其所以能脱出病危时说：“世间所应尽之责任尚未了，而不存一能死之观念”。这是他“自力精神”，“以保持自身之寿命

抵抗疾病之进行”的力量源泉所在。

第二次从 1925 年 10 月至 1927 年 1 月，陈敬贤复在日本访藤田氏研讨他力治疗法。为了加速康复，1926 年 6 月，他在镰仓时，租了田园，亲自种菜锄草，“一面藉外部之劳动以锻炼体力，一面使精神有所寄托，以休养头脑”，移居神户后，定于“每晨五时起床，以冷水湿巾摩擦全身之皮肤，再以干巾擦干。又于早晨、午前、午后、晚间必出野外散步、每次数十分钟”。他采取这些健身措施，目的是早日恢复健康，以便从速回国继续尽心奉献。

陈敬贤因公而忘身，身患重病，却只能断断续续的治疗，未能及时彻底而有效地根治夙疾，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三十年代初期起，陈敬贤专心研究禅理，虔诵佛经，断荤茹素，遍游名山古刹。最后居住杭州弥陀寺，因旧病复发，兼患唇毒疔疮，治疗无效，于 1936 年 2 月 20 日与世长辞，英年早逝，实令人痛惜无限！

陈敬贤病逝后，集美学校师生、校友、村民和厦门各界人士十分哀恸，先后举行了追悼大会，悼念他毕生奉献给教育和社会的丰功伟绩。

在集美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收到各界挽联题词 600 余件，其中有于右任先生的“哀声腾徼外，遗惠溥华南”挽联；有邵力子先生的墨迹：“国尔忘家，公而忘私……”。集美学校还撰写了“敬贤校主追悼歌”，并将陈敬贤生前督建的大礼堂，改署为“敬贤堂”，立碑纪念；编辑出版《陈敬贤先生纪念刊》。厦门大学特将在勤业楼前所建的教工宿舍楼命名为“敬贤楼”以纪念陈敬贤先生为创办厦门大学所作的贡献。这些都是他身后的荣誉。

八十年代初，陈敬贤公子陈共存先生，在集美学村北侧建造佛教墓塔一座。1990年3月14日，陈共存先生举家将其父母暂时寄存在南普陀寺的骨灰，护送回乡，安放入墓塔，落叶归根，德垂千秋。

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陈敬贤先生一生奉献集美学校的功勋，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精神，1991年“敬贤堂”重建落成，这标志着集美学村教育事业已蓬勃发展，发扬光大，实现了陈敬贤生前的宏愿。

雏凤清于老凤声

——记陈嘉庚的女婿李光前

李光前，(1893—1967)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著名的华人实业家，又是热心兴办侨居地及原藉中国福建家乡的文化教育和公益福利事业的慈善家。他是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的长婿，不仅辅佐过陈嘉庚企业的发展，而且极力支持陈嘉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及对当地和家乡开发智力所作的各种努力。他是继陈嘉庚之后，东南亚地区杰出的华人领袖之一。

李光前，原名玉昆。原籍中国福建省南安县梅山芙蓉乡。1893年出生于家乡，排行第二，长兄玉麟，弟玉荣。幼年家境虽贫寒，后来李国专对孩子们的教育相当重视，先后送光前兄弟到私塾受课。后来李国专移居新加坡，1903年李光前十岁时亦前往新加坡定居。他先在当地英印学堂就读，周末到养正学堂(崇正学校前身)学习中文。1907年，清朝政府为了笼络华侨，在南京创办暨南学堂(现在暨南大学前身)，专招南洋华侨学生回国就读。由于李光前学习勤奋，成绩优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吴寿珍于1909年资送他与康需英等人，作为新、马第一批华侨学生回国到暨南学堂就读。李光前在暨南学堂学习两年后，以名列前茅的优异成绩毕业。1911年初他又到北京清华学堂(预科)学习，后转至唐山路矿专门学堂深造。辛亥革命爆发后，由于局势混乱，清皇朝垮台，学校停办，1912年他又回到新加坡。在中国三年多的学习生活，不仅给他的中文及数、理、化知识打下基础，也使他对清王朝的腐败及对辛

亥革命有了感性认识。李光前返新加坡后，先在道南学校及崇正母校任教，并兼任华文报纸《叻报》的电讯翻译工作。不久，他考入当地政府所办的测量专科学校学习了三年，同时还攻读美国一大学的函授工程课。未及毕业，为了谋生，他放弃了学业转入商界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爱国华侨庄希泉（原任全国侨联名誉主席）创办了中华国货公司。由于李光前谙熟中、英文，热爱祖国，经友人介绍到该公司任职，担任英文文书及涉外工作。1916年，陈嘉庚的事业开始发展，为了扩展橡胶贸易至欧美市场，亟需一通晓中、英文的人才，经庄希泉及陈楚楠（新加坡侨商、新加坡中国同盟会第一任会长）推荐，李光前转到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工作，主理中、英文函件及对外联络事宜。由于他工作认真，办事干练，老成持重，精通业务，深为陈嘉庚赏识。不久即被委任为该公司橡胶贸易部经理，并于1920年被陈嘉庚招为乘龙快婿，与其长女陈爱礼结婚。李光前从1916年至1927年在谦益公司工作的十年间，是陈嘉庚事业发展到最高峰的时期。李光前在这期间辅佐陈嘉庚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这十年间，他在陈嘉庚的指导下，不仅在工商业贸易，经营管理知识及经验的增长，以及与中外贸易界的联系等方面为其后来独资经营企业打下了基础，而且使他在思想言行上也深受陈嘉庚的影响和熏陶。

1927年，李光前开始独资在麻坡创办一家制胶烟房。翌年，正式成立南益橡胶公司。创办之初，由于资本有限，又遇到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经营不很顺利。但他利用在谦益公司工作时获得的经验及与各界的良好关系，精心经营终于度过了难关。1931年他吸收了好友叶玉堆、李正树等人入股，扩大资金，将公司改为南益橡胶有限公司，成立了董事会，他被

举为公司董事长。从此，在他领导主持下，随着经济的复苏，对外贸易的发展，公司锐意经营，不断扩大经营业务的渠道和范围，几年间便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他除经营橡胶制造厂、橡胶种植园、及将胶液、胶片运往欧美、日本等国外，还经营黄梨（菠萝）种植园和黄梨罐头厂，企业相继扩展至印尼、泰国等地。30年代后期，他已跃为新、马华侨企业家之一，被誉为执新加坡及马来亚橡胶及黄梨业牛耳的“橡胶与黄梨大王”了。与此同时，他还经营陈嘉庚转给他办的饼干厂，及创办了南益彩色印刷公司，投资合办了东方实业有限公司，均任董事长。此外，他又投资合办了华商银行，任该银行董事会副主席。1933年7月1日华商银行和汇丰银行及华侨银行合并，采用华侨银行之名，他仍任副主席。1937年，正主席徐垂青去世，李光前接任正主席直至1964年底因病才自动辞去该职。该银行是新加坡四家华资创办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也是李光前的重要企业之一，他执有相当大的股份。在他领导下，银行业务取得空前的发展，分行遍布东南亚及中国各地，成了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李光前已是名闻中、外的华侨实业家和银行家。

1941年，李光前赴美国华盛顿参加国际橡胶会议。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相继侵占新加坡和马来亚，他被迫滞留在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在留美期间，他应邀在美国为同盟国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军政人员培训班中任讲师，主讲东南亚政治、经济、地理等概况。他虽旅居异国，却念不忘祖国的抗日事业，曾利用参加世界红十字会美国分部工作之机，积极发动侨胞捐款救济祖国的抗日伤员和难民。

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光前回到新加坡。新加坡在日

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遭到严重的破坏，华侨也遭到严重的损失。战后百废待举。李光前积极协助当地的复兴及重建工作，被聘为新加坡咨询委员会委员，对新加坡的 社会发展及市政建设作出贡献，并努力恢复遭到破坏的南益公司各企业。战后世界各地经济复苏，对新加坡及马来亚的橡胶需要量极大，供不应求。使李光前南益公司的橡胶企业得到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到 60 年代初，南益橡胶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共经营了 14 个厂，18 个办事处，在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有一个厂，一个办事处，巴生有一个办事处，总共有 15 个厂，20 个办事处，他所属橡胶园的总面积达 18500 英亩。

与此同时，李光前还积极向多元化企业发展，并先后开办了南益橡胶、南益黄梨、南益饼干、南益油厂、南益种植、南益彩印、南益（雪兰莪）联合橡胶、炎方生产、炎洲贸易、嘉州橡胶、义成联合、安顺、南亚船务、德美行、福东、福利、新加坡工程、木材工业、新立、半岛、新加坡实业及南亚（伦敦）等 23 家有限公司。在金融方面，有华侨银行（主要股东之一）及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此外，他还设立了“新加坡李氏基”和“马来西亚李氏基金”。李光前已成为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地区屈指可数的著名华人金融家和实业家。其财产总值，外人无法估计，据他本人说，“新加坡李氏基金”和“马来西亚李氏基金”，占其财产的大部分（约 2 亿叻币）。如果他其余的财产等于基金的半数，则应有一亿元，因此，其财产总共估计为 3 亿元叻币。这在当时华人企业家中是不多的。

李光前的思想言行，受陈嘉庚影响很大。他自创公司以后，对陈嘉庚的公司及私人业务，始终如一地进行协助。他一

生常以陈嘉庚为榜样，并继承和发扬陈嘉庚热爱祖国，热爱桑梓、热心文化教育及慈善福利事业的优良传统。成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和社团的著名领袖。

新加坡曾是孙中山在海外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李光前积极支持和拥护孙中山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运动，对孙中山是很敬仰的，1938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新加坡进行的革命活动，保护革命历史文物，李光前和李俊承、陈延谦、周献瑞、李振殿及杨吉兆等爱国华侨慨然捐资购买了孙中山曾居住并作为革命活动重要据点之一的新加坡晚晴园别墅，并进行了维修，献给中华总商会作为革命历史展览馆。至今，晚晴园仍是中、外人士瞻仰之地。

30年代前后，李光前即积极参加了新加坡福建会馆、南安会馆、中华总商会、橡胶公会等社团的活动。同时积极支持和赞助陈嘉庚兴办的各项文化教育事业，1930年后，陈嘉庚的企业经营遭遇困难，为了集中精办好教育事业。陈嘉庚辞去了他于1923年9月创办的《南洋商报》董事长职务。1932年8月，该报脱离陈嘉庚公司，改组为有限公司，李光前及其弟李玉荣和叶玉堆、林庆年等人担任了报社公司董事。1937年，李光前等继续增资，并被推选担任报社董事长，李玉荣为社长兼总经理。在李光前兄弟共同领导下，南洋商报积极宣传中华文化，报导世界各地及当地的政治与经济贸易信息，引导侨商企业的经营；动员侨胞抗日救国，与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相配合，促进华侨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新中国成立后，又客观报导祖国与家乡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维护华侨与华人在当地的合法权益作了积极的贡献。1934年他接任陈嘉庚于1918年倡办的南洋华侨中学董事长职务，长达22年之久，直